

陈济康 吴建华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白话 武经七书

【孙子】

【司马法】

【尉缭子】

【六韬】

【吴子】

【三略】

【唐李问对】



白话 武经七书

陈济康 吴建华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武经七书/陈济康、吴建华编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785-6

I. 白... II. ①陈... ②吴... III. ①兵法—中国—古代②武经七书—译文 IV. E8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194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A5 印张:9

字数:23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序

《白话武经七书》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与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见面了，作者嘱我写几句话。我想，借此机会向青年朋友们谈谈《武经七书》的来由，或许对于学习和认识它的价值，珍视祖国优秀军事文化遗产是会有所帮助的。

中国有文武两个圣人，文圣孔子，武圣吕尚。吕尚俗称姜太公，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追封他为武成王，置武成王庙。武学（军事院校）便设在武成王庙内。唐朝办武学，宋朝更大办武学，讲读兵书。但这时，兵书是作为一般教科书来对待的，并未尊为经典。宋初已有《兵法七书》之名，但这七书只被视为兵法学的一种丛书而已。

《孙子》、《吴子》等七书被尊为经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确定的，约为11世纪80年代。“经”这个字在古代文化典籍上是很神圣的，武经就是军事学的经典。北宋朝廷尊之为武经，公开颁行，是郑重而严肃的。《宋史·乐志》说：“圣朝稽古，崇兹武经。”从此，这七书便如同儒家的“五经”、道家的《道德经》一样，在学术地位上定于一尊。明朝、清朝也都沿袭，没有改变。

七书既是兵学经典，校订刊刻是极为精审的。元丰刊本，已不存世。但南宋孝宗或光宗时的刻本尚存，现藏日本

静嘉文库，国内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

为了适应军事教学的需要，也为了文化宣传上的需要，注释解说武经便成为一时风尚，自宋以来，存世之作不下数十种之多。最早的注本是宋朝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较好的注本有明朝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黄献宗《武经开宗》、李贽《七书参同》等，清朝有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夏振翼《武经体注大全会解》等。

中国是兵法之国，各类兵书数以千计。在浩如烟海的兵书中遴选这七书为经，其珍贵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武经七书》虽是瑰宝，但青年读者要从中获益并非易事：一是古籍线装不易购买，二是文辞艰深不易阅读。现在，《白话武经七书》的出版，略去原文，并在白话之前辅以导读，不仅节省了大量篇幅，而且更易于广大青年读者阅读理解，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值得庆贺。是为序。

吴如嵩

目 录

导论·····	(1)
孙子·····	(23)
导读·····	(25)
卷上·····	(31)
卷中·····	(39)
卷下·····	(47)
司马法·····	(55)
导读·····	(57)
卷上·····	(61)
卷中·····	(67)
卷下·····	(73)
尉繚子·····	(79)
导读·····	(81)
卷一·····	(87)
卷二·····	(95)
卷三·····	(105)
卷四·····	(111)
卷五·····	(115)
六韬·····	(123)
导读·····	(125)
卷一 文韬·····	(131)
卷二 武韬·····	(143)
卷三 龙韬·····	(151)

卷四 虎韬	(165)
卷五 豹韬	(177)
卷六 犬韬	(185)
吴子	(193)
导读	(195)
卷上	(199)
卷下	(209)
三略	(217)
导读	(219)
卷一 上略	(223)
卷二 中略	(231)
卷三 下略	(235)
唐李问对	(239)
导读	(241)
卷上	(247)
卷中	(259)
卷下	(271)

导 论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著称于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漫长的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广袤的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次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战争，锻造出许多无与伦比的军事理论家、军事谋略家和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哺育出一大批震烁古今、名扬海外的军事巨著。中国人民为自己祖先在军事方面的辉煌成就而骄傲，世界人民也对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军事文化宝库赞叹不已。

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通常称之为“兵书”。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在世界军事遗产宝库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以至成为整个东方军事文化的核心，被称之为“东方兵学”。与西方的古代军事著作相比，中国古代兵书在思维方式、表达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特点。它不但对后世——包括现代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且对非军事领域的许多部门，如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商业经营、体育竞赛、公共关系以及外交谈判等等，都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无古不成今，鉴古为知今。今天，我们学习一点古代的优秀兵书，对于继承中华民族的宝贵军事文化遗产，开阔我们的眼界心胸，启迪我们的聪明智慧，以至振兴中华、建设祖国都是不无裨益的。中国的兵书，卷帙浩瀚，种类繁多，仅见于记载的就有三千余

种，两万多卷，现存的也有一二千种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在这兵书的海洋中，有许多五彩斑斓的明珠，其中最耀眼夺目、最有价值、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被尊为军事经典著作的《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的由来及流传

《武经七书》是北宋王朝为培养及选拔文武兼备的军事将领而颁发的军官必修教材。北宋建国初期，北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夏政权。北宋在与辽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被迫于公元1004年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同意每年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之为“岁币”。后来在与西夏国的战争中，又一再受挫，于公元1044年与西夏订立了和约，同意每年给西夏银、帛、茶叶等共计合银25万5千两，称之为“岁赐”。

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远比辽、夏为强的中原大国北宋，为什么总是吃败仗、受屈辱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军队战斗力不强和将领指挥不力，则是最直接的原因。所以王安石在危局中实行变法图强，把军事改革作为主要内容之一。他改革兵制，精简军队，于1073年将一度产生即被废弃的武学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开办的正规军官学校。学校由枢密院选派有军事才能的优秀文武官员担任教授，第一批招收100名学生入学，并设立武学学官和武学博士，使用的教材开始是《孙子》、《吴子》和《六韬》。随着武学制度的健全与发展，到公元1080年，宋神宗命令国子监官员朱服、何去非等校订《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和《唐李问对》七部兵书，作为武学课程的必修教材，并雕版印刷，总称《七书》，尊为“武经”。“武经”，就是军事上最神圣的“经书”，人们对它只能顶礼膜拜，规规矩矩学习照办。从此，《武经七书》就被定为官书，并作为一个整体流传至今。

南宋初年，宋高宗不但令武学学生学习《七书》，而且把它作为三年一次武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下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在国子监读书的公侯、附马、伯及都督以下军将子弟学习，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为军官。清王朝建立后，沿袭宋明之制，武科考试仍把《武经七书》作为重要内容。

《武经七书》中除《唐李问对》为唐代撰写外，其他六部都是先秦或秦汉时期的著作，当时这些兵书是刻写在木牍或竹简上的，因而文字简约，语义较深，宋代的武学生已难以深刻理解。虽然有的已有注解，但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注释不一。为统一认识，使解释符合宋王朝的需要，宋朝统治者将武学中所用的《武经七书》教材，定为在武学“上舍”授课的施子美所著的《武学上舍施氏七书讲义》，简称《七书讲义》。当时武学分上舍、内舍、外舍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每年春秋考核，将武艺精良而又对《武经七书》融会贯通，能写出优秀军事论文（策略）的优等生补入上舍。上舍生可直接参加皇帝的殿试，根据成绩分别从优授以官职。

《七书讲义》在宋代有刊印本，印出不久，大约在公元1276年前传入日本。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467—1573年），《七书讲义》被奉为经典，流传极广。中国国内宋刊本在明代即已失传，目前使用的主要是1927年“自强书屋”根据日本文久三年（公元1863年）官刊本石印的版本。《七书讲义》和它前后的注释本都有所不同，最具“讲义”特色。它在每书前面，都有一段题解，概述作者、成书、存佚等情况，然后分段解释。它的最大特点是不在字句上作训诂，而在把握原著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讲解、分析；不是空谈理论，而是联系实际，从历史上寻找实例来阐明书中所蕴藏的思想。学者可从这些实例中明白“古人成败之迹、奇正之用”。这比一般的注释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入、更有启发性，所以“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七书讲义·江伯虎序》）。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让军官子孙学习兵书，而当时施子美的

《七书讲义》已在元代战乱中佚失，所以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中进士的刘寅，又撰写了《武经七书直解》。它的特点是既有文字训诂，又有意义解释，同时也举史例参证，通俗易懂，是《七书讲义》以后各种注本中较好的一种。此后又出过不少注释本，但都缺乏新意，只有清代朱镛编的《武经七书汇解》稍有特色，它把前人对七书的注解全部辑录汇总，对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人员曾对《武经七书》进行了较详细的注释，以《中国古代兵法》为名在内部发行。解放后，叶剑英元帅对古代兵法的研究极为重视，他在《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遗产。我们要吸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彩。”1964年，叶剑英元帅指示原南京军事学院对《武经七书》进行注译，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近十年来，研究人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武经七书》重新研究考证。经过几年的努力，1986年，《武经七书注译》终于出版。之后，又有一批研究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也存在一些尚待继续研究的问题。现在，已有更多的学者和有志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可以预见，《武经七书》这颗古代明珠，必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武经七书》的主要军事理论成就

《武经七书》成书于宋代，但它所包含的七部兵书则是先秦至唐代的著作。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未统一，各诸侯国相互攻伐争霸，战争不断；秦统一中国后至唐代，在巩固发展封建王朝的过程中，内外战争仍然频繁，天下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仅有记载的战争就达一千一百余次。伟大的战争实践锻造出伟大的军事思想。《武经七书》正是先秦至唐代所有战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由于它

具有丰富的内容、深邃的思想，又经历代战争实践反复检验，因而它也成为整个冷兵器时代、千余年间数千部兵书的精华和代表作。宋王朝能从数百部兵书中精选出这七部，作为军官必修教材，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

《孙子》总结了春秋时代和它之前的战争经验，并吸取了前人的理论成就，创造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杰出框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体系的坚实基础。它提出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理论原则，其中有些至今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局限，许多理论问题还阐述得比较简单或不够全面。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战争的不断发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等兵书应运而生，它们在继承《孙子》思想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特点，对《孙子》的理论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以唐代出现的《唐李问对》一书为标志，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理论可以说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

《武经七书》之后，虽然出现了更多的兵书，而且也各有其特点和发展，但从高度抽象的理论角度来看，大多未能超出《武经七书》的范围和深度。所以直至清代，朝廷仍以《武经七书》作为武科取士的主要考核内容之一。

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代表的《武经七书》，文字虽然不多，共计只有六万多字，但其内容几乎涉及现代军事学中的所有分支学科，如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等等。如果将其提出的军事理论概括地予以划分的话，主要有四部分，即战争性质的理论、战争指导的理论、作战指导的理论和军队建设的理论。

在战争观的问题上，代表春秋时期争霸战争的军事思想的《孙子》，还只认识到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提醒人们要慎重地对待它，不能感情用事。代表战国前期由争霸战争向兼并战争演变的军事思想的《吴子》，就进一步探索了引起战争的五种原

因，并将战争归纳为五种类型，要求人们区别对待。代表战国中期由兼并战争向统一战争转化的军事思想的《尉繚子》，则更明确地将战争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与《尉繚子》基本上同时成书的《司马法》，又深入一步，提出了“以战止战”的口号，认为为了和平而战是应该的，为了解救人民而进攻别国也是应该的。在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人民的关系上，它们都初步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手段，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人心向背是影响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等问题。这些认识，虽然还比较肤浅并带有很大的感性的色彩，但在两千多年之前能提出这样的命题，并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战争指导问题上，《武经七书》所论述的全都是如何获得战争胜利的理论。首先，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武经七书》认为主要有五点，即政治上的人心向背，经济上的实力强弱，将帅人才的优劣和气象、地理等条件是否有利。它同时认为这五个因素是一个整体，战争胜败有赖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某个单独因素就能决定的。重视从整体上考虑得失，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其次，争取战争胜利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武经七书》认为，在具备取得胜利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运用谋略指导战争，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的主要途径。强调智能制胜，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再次，通过智能制胜的途径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武经七书》认为，最好的结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不单纯依靠战争手段，或消耗最少限度的实力，就使敌人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力求得战略上的“全胜”。求“全胜”的境界，也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大特点。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被公认为西方著名军事理论家的克劳塞维茨，他的军事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与“全胜”思想完全对立的。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他在《战争论》中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有一种巧

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都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但是，古今中外特别是当前的许多事实都证明，克劳塞维茨的论断是错误的，而《武经七书》的论断则闪烁着光芒。最后，有了最佳的战略目标，如何才能保证战略决策正确呢？《武经七书》认为，只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制定正确的决策。不仅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还要知对手之谋，要从正反、内外各方面了解对手的“心”和“情”。主、客、时、空四维度的情况都掌握了，才能正确地估计战略形势，找出敌人的弱点，定出恰当的对策。为获得必须的情报，《武经七书》主张“用间”，并提出要用“上智”之人去充当间谍。

在作战指导问题上，《武经七书》提出的几个主要原则是：一、“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形篇》）。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求战前要有充分的物质、精神准备，在情况分析基础上预测出胜利的概率后，再制定周到缜密的作战计划，然后才能发动战争。二、“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尉缭子·战威》）。这是要确保战争主动权，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出于自己的愿望，避免做自己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对于敌人，则要能调动它，让它按自己的愿望行动。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迷惑、欺骗敌人。三、“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就是避实击虚，攻其弱点。这里所谓的虚和弱，都必须切中敌人的要害之处。为此，必须运用“奇”、“正”之法，使敌人之虚实暴露，尔后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夺取胜利。四、“因形用权”，“因敌制胜”（《吴子·论将》、《孙子·虚实》）。就是在战术运用上要机动灵活，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采取适当的权变措施，以变制变。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武经七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体现在人才观上。它要求选贤任能，强调用人得当。特别是对于将帅的选拔任

用，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它认为将帅是军队的核心，将帅在素质上具备凝聚力、吸引力和推动力，才能成为军队的灵魂和头脑，将帅是“国家安危之主”（《孙子·作战》），“得之国强，失之国亡”（《吴子·论将》），“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所以“置将不可不察也”（《六韬·龙韬·论将》）。选用将才的标准，《武经七书》中有许多不同的论述，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要求德才兼备，文武全才。《孙子》提出的是“智、信、仁、勇、严”，《吴子》提出的是“理、备、果、戒、约”。其他一些提法，大致可包括在这十个字之中。“智”，就是要具备接受、转化和运用知识的素质，有理论思维能力和洞察力。有了“智”，才能“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用兵之法”，知“迂直之道”，知“自保全胜”之术；才能“料敌”、“庙算”，并预测“先知”。“信”，就是要具备高度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战必胜，国君不让打也敢于去打；战必不胜，国君让打也坚决不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样的将领才是真正的良将。“仁”，就是要具备爱人的思想。要爱惜兵力，重视士兵的要求，与士兵同甘苦、共安危，这样就可以得到士兵的信任和爱戴，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勇”，就是要英勇无畏，具备敢于冒险、敢于开拓的精神，但决不是一己的匹夫之勇。“严”，就是要具备自身严正、处事严肃、治军严格的素质。“理”，就是要具备“治众如治寡”的领导能力。“备”，就是要具备“出门如见敌”的常备不懈的敌情观念。“果”，就是要具备“临敌不怀生”的奉献精神。“戒”，就是要具备“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约”，就是要具备“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炼作风。至于对一般官兵的使用，《武经七书》主张“因其情而用之”，就是根据各人的心理素质和智慧、能力，分别给以能发挥各自长处任务。

关于军队的组织纪律，《武经七书》主张制定健全各种法令制度。它认为“制必先定”（《尉缭子·制谈》），才可能使全军有统一行动的准则，作战时才能发挥整体的力量；同时强调“以赏为表，

以罚为里”（《三略·上略》），认为只有“信赏必罚”，并做到“杀贵大，赏贵小”（《六韬·龙韬·将威》），才能鼓舞士气，团结内部。此外，在军队编制、战斗编组、指挥信号、通讯方法和司令部的编成上，《武经七书》都有许多论述。

关于军队的教育训练，《武经七书》强调要进行思想教育。它主张“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吴子·图国》），也就是用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对军队进行灌输，使其具有为统治者而战的奉献精神 and 羞耻之心。

以上所概括介绍的仅仅是《武经七书》的部分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它所包含的军事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武经七书》的军事思想理论水平，基本上已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不愧为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和代表。

《武经七书》是古代军事哲学的代表

中国古代兵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它所具有的很强的哲理性。它把军事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以哲理谈军事，从而使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密切结合起来。

中国古代兵书既是军事学的载体，又是哲学的载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兵书就是军事哲学书，甚至说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之一也决不过分。有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的辩证法是从兵书中来的”，“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武经七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武经七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闪耀着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光辉。它认为，战争和万物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运动，是可知的；战争胜利的取得，必须建立在全面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之上。只要认真探索双方的政治、经济、天时、地利、将帅、制度等

对战争胜败起决定作用的一些因素，把它们一一进行对比，就可以预测战争的胜败；而这种“先知”，不能靠求神问卜，不能靠主观想像，只能靠人去侦察，去搜集信息，去分析判断，一切都“必取于人”（《孙子·用间》），“人事而已”（《尉缭子·天官》）。古代许多著作，将“道”和“天”说得玄而又玄，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武经七书》则对此作了唯物的解释。它认为，所谓“道”，就是政治上能得人心，是战争规律；所谓“天”，就是天候、时令，是自然现象。不少学者在论述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史时，根本无视于中国古代兵书，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其实，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兵家是最具有无神论思想的一家。

《武经七书》的哲理性，最集中地体现在贯穿全书的辩证法上。它是那么丰富，那么生动，从头到尾充满了有关对立统一概念的论述，如奇正、虚实、强弱、利害、攻守、迂直、治乱、劳逸、主客等等。它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相克相长的，对立双方既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互相转化。比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势篇》），“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军争》），“无不备者无不寡”（《孙子·虚实》），“必死则生，幸生则死”，“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奇正相变”，“奇正相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唐李问对》）等等。

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的对象是普遍的、整体的，带有超越时空的性质，而军事哲学，则是哲学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哲学代表的《武经七书》，对现代战争以及其他许多科学，特别是带有斗争、竞赛性的领域，如企业管理、市场竞争、体育比赛、外交谈判等等，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